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弘扬抗战精神 赓续红色血脉

编者按

9月28日,“云南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在昆明举行。座谈会上,来自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云南日报、省社科院、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云南大学出版社、省飞虎队研究会、省滇西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9家单位的专家分别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如何弘扬抗战精神,如何发挥抗战遗址作用,怎样坚持正确二战史观等方面作交流发言。文史哲本期开始陆续摘编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可靠的主心骨

张德兵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从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到领航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可靠的主心骨。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

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战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

图存的希望,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强大的思想引领力、广泛的社会动员力,带领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浴血于大江南北、驰骋于长城内外,苦战于白山黑水,为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发起民族救亡运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积极倡导并推动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发布《八一宣言》,召开瓦窑堡会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全国基本上结束了国内长期处于分裂、动荡、混乱和一盘散沙的局面,使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爱国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和

行动。全民族抗战新局面的出现,是中国共产党发挥重要作用的结果。

领导民族独立运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通过起草发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进一步发动和组织人民进行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向全国人民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和敌我动态,宣传党的政治主张、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指明抗战的光明前途,促进和巩固全国人民大团结,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和胜利信心,成为了团结抗战的坚强核心和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主心骨。

开辟敌后战场。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大胆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取得全面、彻底的胜利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

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中国抗战的正确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系统、整体地

落实党的领导,把党领导的最大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最强治理效能,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可靠的主心骨。

二是把新時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推向前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时刻绷紧自我革命这根弦,持之以恒答好自我革命这道“必答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不断凝聚亿万人民“想在一起”的团结之心、激荡“干在一起”的团结之力,共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滇缅公路承载的精神价值与时代意义

杨绍军

今天,我们汇聚一堂,共同缅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致敬一种穿越时空的精神。滇缅公路,这条诞生于中华民族危急关头的“生命线”和“输血线”,其不仅是交通运输动脉,更是承载着抗战记忆、地理空间与家国情感的永恒之场。

滇缅公路是抗战的记忆之场

记忆,是历史的容器,是精神的传承。滇缅公路,首先是一座恢宏而沉重的“记忆之场”,其铭刻着中华民族面对存亡绝续时的非凡抉择与坚韧不屈。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国沿海港口相继沦陷,国际援华物资通道几近断绝,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在此危难之际,为了打破封锁,获取国际支援,保障抗战的生命线,1937年底,国民政府决定抢修从云南昆明通往缅甸腊戍的公路,即滇缅公路。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需要穿越崇山峻岭、激流险滩,地质条件复杂,气候恶劣异常。然而,救亡图存的信念压倒一切困难。

自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20万云南各族民众响应号召,自带口粮和简陋工具,奔赴筑路前线,以“血汗染赤泥土,白骨砌就路基”的悲壮,奋战在长达近千公里的工地上。

滇缅公路的修筑,就是伟大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最生动、最具体的实践和体现。

滇缅公路是抗战的空间之场

空间,是历史的舞台,是行动的场域。滇缅公路,更是具象的“空间之场”,其以独特的地理存在和战略功能,深刻地影响抗日战争的进程与形态。

这条蜿蜒于横断山脉、高黎贡山的公路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由无数个具体险要地段组成的实体空间:畹町桥、惠通桥、怒江、澜沧江……每一个地名,都是血与火的见证。这条空间通道,成为抗战中后期中国与国外联系的唯一陆上国际运输通道。

从1938年通车到1942年5月缅甸沦陷,滇缅公路抢运军需物资,以及大量汽油、药品等民用物资。上万辆卡车昼夜不停奔驰在这条“输血线”上,

书评

千年跨越的边疆治理密码：从“直接过渡”到全面小康的中国实践

金学丽

边疆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始终是制约或推动国家整体现代化进程的核心要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将边疆治理纳入国家理政的核心议题,持续推动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迈向新高度。西南边疆“直过民族”的发展历程,正是中国共产党有效破解边疆治理难题、创新治理模式的典型范例。

张晖所著《跨越千年:从“直接过渡”到全面小康》以宏阔的历史视野与细腻的田野叙事,全景式呈现了西南边疆独龙族、景颇族、傈僳族等“直过民族”,在党的领导下,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迈入社会主义社会并实现全面小康的跨越发展历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再次跨越”所取得的历史性伟大成就。这部著作不仅是对边疆民族发展实践的系统总结,更是对中国特色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深入探索。它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边疆民族地区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为多民族国家边疆治理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实践范例,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边疆治理中的具体体现具有重要价值。

历史困境:传统治边体系的瓦解与近代边疆危机。历代中央王朝秉持“大一统”思想,基于“华夷之辨”,构建起与内地不同的边疆治理体系,形成了“内地郡县制-边疆羁縻制”的二元结构。从秦汉时期的“边郡制度”,到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中央王朝主要通过“以夷制夷”的策略维持边疆稳定。在这种治理模式下,部分民族一直处在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生产方式停留在刀耕火种阶段,与内地的经济文化差距持续拉大。“以夷制夷”的边疆治理体系在近代殖民冲击下暴露出脆弱性。19世纪以降,西方列强通过军事侵略与文化渗透,对中国传统边疆治理体系发起冲击,西南边疆成为“文明冲突”的前沿。民国政府虽提出“边疆开发”计划,但政策多停留在纸面上。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西南边疆各民族呈现出多层次的社会形态,这种多层次的社会形态并存局面,为新中国边疆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直接过渡”政策的探索与实施。“直接过渡”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边疆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新中国成立后,针对部分边疆民族社会发展滞后的特殊情况,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直接过渡”政策,帮助这些民族跨越奴隶制、封建制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书中强调,这一政策并非简单的制度移植,而是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共产党将其具体化为“团结—生产—进步”的实践模式,与苏联强制推行集体农庄的模式不同,中国通过建立“生产文化站”等过渡性组织,在尊重和保留民族传统社会组织的基础上,逐步注入社会主义因素。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直接过渡”政策得到全面且富有创造性的实施。通过土地改革、扫盲运动等一系列现代治理手段,实现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双重跨越。这种“传统合法性+现代治理”的复合模式,既避免了苏联式激进改革的阵痛,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窠臼,开创了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新范式。

新时代的“再次跨越”:从脱贫攻坚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为边疆治理开启了新篇章。随着景颇族、傈僳族等“直过民族”消除贫困、步入小康,边疆“直过民族”治理从“消除贫困”转向“共同富裕”,政策逻辑从“兜底保障”共同“内生发展”。独龙族的整族脱贫案例被纳入联合国全球减贫案例库,成为发展中国家可借鉴的东方样本。

理论价值与世界意义:中国边疆治理的范式创新。从“直接过渡”到“全面小康”的两次伟大跨越,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在边疆地区的成功实践。《跨越千年:从“直接过渡”到全面小康》一书揭示,这一过程的深层逻辑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社会跨越理论从“制度建构”推向“治理效能”的更高层次。中国不仅实现了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跨越,更通过产业现代化、文化认同深化、治理体系创新,构建起边疆与内地“命运与共”的现代化共同体。

(作者系云南人民出版社编审)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对正确二战史观的强调,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二战历史基本立场的庄严宣示,也彰显了坚守正确二战史观、驳斥历史虚无主义的重大现实意义。

坚持历史客观性,筑牢正确二战史观根基,粉碎历史虚无主义“虚化事实”

历史客观性是史学研究的首要原则,更是正确二战史观的基石。认识历史绝不能主观随意地挑选材料“解构”“裁剪”历史,将历史当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虚无主义则通过“断章取义”“以偏概全”“选择性失明”等手段,割裂证据之间的联系,用唯心史观否定历史的客观可知性。“细节否定法”,通过放大个别历史细节的争议,否定整体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语境歪曲法”,通过剥离历史事件的背景语境,歪曲历史事实的性质。“史料筛选法”,刻意筛选对自身观点有利的“证据”,对二战史进行有针对性的“虚无”。

尊重历史事实是坚持正确二战史观的根本前提。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必须坚决捍卫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的历史地位,承认中国军民的巨大牺牲与卓越贡献,这是坚持历史客观性原则得出的必然结论。

把握历史规律性,锚定正确二战史观核心,驳斥历史虚无主义“虚化真理”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角下,历史并非杂乱无章的事件集合,而是遵循客观规律发展的过程,这些规律能被人类认识和运用,指导人们把握当下、开辟未来。从这一视角审视二战,其爆发与胜利绝非偶然,既是资本主义世界矛盾激化、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必然产物,也是反法西斯力量团结奋斗、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归宿。正确二战史观的核心要义,在于从历史事实深刻揭示“正义、光明、进步必将战胜邪恶、黑暗、反动”的历史必然。而历史虚无主义则通过否认历史规律、歪曲胜利本质,消解人类对和平与正义的坚守,宣扬“战争无正义性”,否定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鼓吹“强权即真理论”,歪曲二战胜利的原因,解构“反法西斯同盟论”,刻意放大反法西斯同盟内部的矛盾,为单边主义张目。

坚持正确二战史观,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将唯物史观作为“看家本领”,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运用唯物史观剖析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本质,明辨是非曲直,遵循历史的发展规律。

发挥历史育人功能,彰显正确二战史观价值,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虚化价值”

正确二战史观的最终目标,就是激

活历史的育人功能,让二战历史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为人们提供价值坐标。而历史虚无主义则通过消解二战历史的价值,切断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使人们失去精神支撑,以“还原真实”“打破神话”为借口,用碎片化细节歪曲英雄形象,“淡化苦难”,消解历史的警示意义,“割裂联系”,刻意将二战历史与当代社会剥离开来。

历史的价值源于对其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把握。只有认清二战史“反对侵略、追求正义、捍卫和平”的主流,坚信“光明必将驱散黑暗,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必然,才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与力量,只有跳出“碎片化”“极端怀疑”的思维局限,才能从史料的真实过渡到历史的真实,得出科学结论。

中国共产党倡导正确二战史观,高规格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绝非为延续仇恨或煽动对立,而是源于二战史观不仅直接关乎对中国抗战历史的公正评价,更关乎战后国际秩序的维护、当前与未来国际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以及世界和平的持久维系。为此,我们必须坚守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正确二战史观,遵循历史的客观性、规律性与价值性,充分发挥其资政育人功能。通过坚决批判各种虚无二战史、抗战史的观点和行动,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质、历史价值、时代意义永放光芒。

(作者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

铭记和赓续西南联大薪火

李红英

西南联大的历史,本身就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诗中一曲激昂而奋进的乐章,是伟大抗战精神在教育文化领域的生动实践和光辉缩影。我想从“铭记”与“赓续”这两个关键词出发,谈几点学习体会。

深刻铭记:西南联大的历史是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见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西南联大的诞生、办学与成就,正是这一“历史转折点”上、和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平津沦陷。为存续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教育血脉,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先至长沙,后西迁昆明,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联大师生跨越湘黔滇,徒步三千五百里,在烽火连天、物资匮乏的极端困境中,坚守着“教书救国、读书报国”的信念,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和“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的真实写照。

在昆明的八年岁月里,日军飞机频繁空袭,“跑警报”成为常态,但“轰炸愈猛,读书愈勤”。铁皮屋顶、茅草房舍及其

简陋,却成为了西南联大知识的“殿堂”。教授们呕心沥血,著书立说;学生们箪食瓢饮,孜孜不倦。华罗庚在牛棚中完成巨著,吴大猷在硝烟里坚持实验,闻一多“最后一次讲演”慷慨激昂……这一切,无不闪烁着“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西南联大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邓稼先、朱光亚等8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昆、刘东生、郑哲敏等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以及175位院士、大师辈出,硕果累累。这奇迹的背后,正是抗战精神所赋予的强大精神动力。西南联大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抗战精神史,一部知识分子的爱国奋斗史。

自觉赓续:让西南联大的薪火照亮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历史并非尘封的过往,精神需要时代的传承。作为西南联大历史的守护者和讲述者,我们深感“赓续薪火”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首先,要赓续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奋斗精神。在今天相对优越的环境中,我们更需铭记曾经的苦难与艰辛,从联大师生于逆境中奋发图强的故事里,汲取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和力量。

其次,要赓续“教育救国、科学报国”

的担当之志。西南联大的师生将个人的学术追求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学术绝非象牙塔中的孤芳自赏,真正的学问必然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同频共振。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更应心怀“国之大者”,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再次,要传承弘扬科学求真之风。联大之所以能在困顿中创造辉煌,与其求真务实、对标国家困难和需求的学术环境密不可分。这种精神对于今天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营造创新氛围,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西南联大博物馆不仅是一座保存历史记忆的场馆,更是一个传承伟大精神、启迪未来的重要平台。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进一步深化对西南联大历史与精神的当代研究阐释,讲好联大故事背后的抗战精神、爱国精神和科学精神,努力将其建设成为激发爱国热情、培育民族精神、陶冶道德情操的重要课堂和窗口,让跨越时空的联大薪火,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作者系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



云南省博物馆“大动脉——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主通道与生命线”主题展览。本报记者 陈飞摄